

从《最新宁波城厢图》看地图上的宁波

邹振环

虽然算不上是正宗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但是我一直对古旧地图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陋室上万册的藏书里，新旧地图册占着不小的比例。每到一地，我都有购藏不同时期该地新旧城市图的嗜好。此次来宁波交流，有幸获赠由宁波市档案馆编、龚缨晏教授执行主编的《地图上的宁波》（中国地图出版社2017年12月）一书，欣喜不已。

《地图上的宁波》汇集了300幅与宁波有关的各种地图，包括古旧地图和现代地图，跨越了宋、元、明、清及近现代700多年历史。全书精心策划，分类尤见编者之匠心独运，所分“地雄东南”、“域统山海”、“境分乡邑”、“图呈万象”和“港通天下”五个部分，既从中国大框架内看懂宁波，有“全国地图上的宁波”、“浙江省地图上的宁波”，也有从微观类型上的审视，如从“宁波城区地图”、“各县市区地图”、“乡镇地图”等。书中收录的《府境》《罗城》《府治》《郡圃图》《鄞县县境图》《鄞县县治图》《奉化县境图》《奉化县治图》《慈溪县境图》《慈溪县治图》《定海县境图》《定海县治图》《昌国县境图》《昌国县治图》《象山县境图》和《象山县治图》等16幅地图，提供了现存最早的宁波区域地图。在“全国地图上的宁波”部分中，搜集了《郑和航海图》《古今形胜之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雍正十排图》等明清学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所呈现的宁波地区。最富有创见的还在于编者将宁波地图文献放在一个全球史的视野之中，采纳了部分西方人绘制的宁波地图，如最早的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以及奥特柳斯《世界地图》、洪第乌斯《世界地图》、罗明坚《浙江地图》、布劳《亚洲新图》、卫匡国《浙江省地图》、卫三畏《中国地图》等。整个图册不仅将宁波置于中国历史和浙江地方史的宏观背景下来系统展示宁波区域和宁波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试图从不同角度说明宁波在全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及特色。

我虽然不是在宁波出生的，但是60年来的个人履历表中的祖籍，都是填写“浙江鄞县”。小时候就对“鄞县”一地很好奇，父亲说明清的宁波所在城邑为鄞县，因简称“鄞”，又由于地处甬江之畔，亦简称“甬”。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出生在民国初年的宁波人，因此，我一直对清末民初的宁波有着浓厚的兴趣。《地图上的宁波》（页160—161）收录了一幅由宁波市档案馆收藏的《最新宁波城厢图》（新学会社于1914年发行），该图是由位于上海闸北沪宁车站后面的华新石印局印刷的。图中准确地绘制出宁波城墙以及东门（东渡门）、南门（长春门）、西门（迎恩门）和北门（永丰门），以及细致地绘出了城市中的天一阁、天主堂、日湖月湖，父母亲年轻时经常游玩的月湖中的范祠、关帝殿、财神殿、贺公祠、月湖庵，甚至陆殿桥、尚书桥、月湖桥、水月桥等，都一一清晰呈现。在地图测绘方面，近代日本一直以准确和细致闻名遐迩，但比较1917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出版的《宁波府城之图》（页162—163），我们会发现《最新宁波城厢图》著录的街道名称和地标名号似乎更多、更细致。

出版《最新宁波城厢图》的新学会社究竟创办在何时，创办人是谁？统共出版过多少图书？学



界众说不一。现在可以查到，新学会社是1902年开办在宁波东门口的日新街，之后因为得到了宁波国人第一家铅印印刷厂——钧和印刷所的创办人李霞城的巨额资金支持，1903年把总部迁到上海棋盘街交通路，并在济南、天津、北京、广州各大城市都设了分店。但位于宁波东门日新街的新学会社分所并未撤消，从后来《东方杂志》所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外埠代售处名录来看，宁波的新学会社还是其代售机构之一。从1925年印刷该社的《图书汇报》中可见，出版的图书范围也非常广泛，举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都有涉及。该《图书汇报总目》将之前出版的图书分为农业、林业、园艺、畜牧、蚕桑、医药卫生、工艺、商业、理化数学、法政经济、学校用书、文学、修养、杂著、碑帖、舆图等十六类。其中“舆图”一类文献不在少数，如《天下最新全图》《中华最新道制图》《最新中华舆地全图》《中国交通全图》《汉口市街全图》《中国商埠全图》《古今人名地址图》《中国盐产一览图》《中国铁路全图》《济南青岛全图》和《东洋历史地图》等，其中尤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奉化周世棠、孙海环两人所编的《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影响最大。虽然之前曾专门留意过宁波新学会社出版的多种地图文本，但却无缘看到鄞县人李海澄绘制的《最新宁波城厢图》这幅珍贵的地图文本。这些由宁波学人编纂、由新学会社推出的重要的地图文献，将对现在宁波城市文化的规划和城市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宁波作为一座濒江近海的港城，其城市功能不仅发挥着地方行政中心的作用，也扮演着水陆转运枢纽的角色。宋代以后，随着国际贸易线的重心由陆路转向海道，宁波也日益凸显出海疆重镇的风貌。在明朝洪武之初，就在泉州和宁波等地设立了市舶司；清初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设了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浙海关即在宁波。由于有着航道辐辏、物产丰盈优越的环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宁波不仅是中国东南沿海一个繁盛的贸易商埠，也是老资格的东亚贸易的港口城市，在东亚海域交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的综合性亚洲计划“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即所谓特定领域的“宁波研究计划”，就是一个集合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船舶工程等134位执教于日本各大学的研究人员参加的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可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宁波不仅北至辽东、南达闽广各地，是东亚与日本等沿海各国具有极其广泛贸易和文化往来的焦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枢纽港。通过这本图册足以看出宁波在“一带一路”上的地位。《地图上的宁波》的出版，无疑是今后宁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甬上藏书归天一（三）

胡白水

甬上范氏家族，似乎具有特强的藏书基因，几乎与范钦这样著名藏书大家的同期，又出人意料地出了第二个藏书大家，他就是范钦的侄子范大澈。

范大澈（1524—1610），字子宣，号讷庵，别号南海钓者、句章灌园叟，是范钦兄长范鏞的长子。范大澈自小聪明伶俐，喜爱读书，进步神速，惹人欢喜。范钦对这个侄子视为己出，把下一代中兴范氏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平时多有教诲和提携。范钦在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带26岁的大澈进京，并引荐给宁波老乡、建极殿大学士袁炜（1507—1565），大澈被袁聘为塾师。明隆庆三年（1569），范大澈补鸿胪寺序班，以后就多次出使海外藩国，曾“七奉玺书，进秩二品”，果然成为范氏家族的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

范大澈似叔父范钦“性酷嗜钞书”，但他几次向天一阁借书，均遭叔父拒绝，在心中颇为不悦的同时，也激起了他收书藏书的决心，暗暗发誓要超越其叔。他节衣缩食，把月俸收入都用来聚书；他趁出使之机，重价购求海内外异本秘籍；他家养善书者多至二三十人，借抄善籍孤本不止。这样，经过连续几十年的不懈追求，终得秦汉以来图书至四五千有余，藏书之富几与天一阁相埒。又据《鄞县志》称其所收藏的秦汉以来的印章达四五千枚之多，为明代集藏古印第一人。

曾因叔父拒借藏书而奋发藏书的范大澈，每次用重金购得天一阁所没有的珍本时，在欣喜若狂的同时，必然设法向叔父夸耀一下。他在家里，准备好佳肴香茗，故意在茶几里放上新得的珍版秘籍，再请叔父来舍间小酌，而自己却中途借口暂离。嗜书若命的范钦看到几上难得一见的古籍珍本，两眼发亮，爱不释手，心里既是羡慕又是嫉妒，但表面上还是坦然处置，一笑了之。这个范氏家族内的藏书佳话，四百多年来一直流传至今。这也说明范大澈的藏书确有超过天一阁的亮点。